

俄罗斯入世以来经济治国方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余淼杰,徐睿迪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要:为了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经济治国方略的内在逻辑,深化中俄合作,以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时间节点,对俄罗斯经济基本面和普京经济治国方略的重点方向进行系统分析,从“国际-国家-社会”三层次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机制解释。研究认为,俄罗斯入世以来经济治国的方向主要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减少对企业监管限制、促进消费和投资来增强市场活力,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国际层面,入世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但是开放贸易下资源型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挤占了其他经济部门发展资源,使得俄罗斯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调整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的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俄罗斯坚定地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战略的制定体现了的国家自主性;俄罗斯国内社会形成了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直接影响了具体经济议题上的政治决策,经贸政策既紧密团结独联体国家又实行“向东看”战略。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联盟理论;要素禀赋;内外互动;俄乌危机

中图分类号:F151;D8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2)05-0010-13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Russia's economic ruling strategy since its accession to the WTO

YU Miaojie, XU Ruidi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Russia's economic ruling strategy, and deepen Chinese-Russian cooperation, this study takes 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s an important time poin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收稿日期:2022-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5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VMG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3005)

作者简介:余淼杰(1976-),男,广东饶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

the key directions of Putin's economic ruling strategy,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from the three "international-national-society" dimen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main directions of Russia's economic ruling since it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clude promo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enhancement of market vitality by reducing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businesses,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mitig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TO has made Russia mor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the factor endowment advantage of resource-based countries under open trade has crowded out the development resources of other economic sectors, which may lead to impoverished growth in Russia, and it is imminent to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hat is overly dependent on energy and other raw material products. Russia firmly promote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ies reflects national autonomy. At the domestic society level, Russia has formed an industry-based political allianc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on specific economic issues. It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not only closely unites the CIS countries but also implements the strategy of "Looking East".

Key words: Russia;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union theory; factor endowm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Russia-Ukraine crisis

2012 年 12 月 16 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八次部长级会议正式批准接纳俄罗斯成为其第 156 个成员国,俄罗斯终于结束了历时 18 年的入世谈判“长跑”。无论是对于国内经济还是世界经济体系,俄罗斯入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俄罗斯而言,入世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既能够更大程度帮助俄罗斯经济融入开放的全球经济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俄罗斯需要承担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将国内经济发展的短板呈现在世界市场下。本文运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贫困化增长和社会联盟等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于国内经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试图为俄罗斯经济治国方略提供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释。

一、文献综述

(一) 有关入世以来俄罗斯经济基本情况及经贸政策的研究

从历年来发展趋势变化的角度,李建民从普京

执政 20 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经济陷于停滞的深层次原因、政府经济政策取向等角度入手,分析了普京领导之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和未来趋势^[1];张聪明以普京主政 20 多年来所发表的国情咨文为基础,对普京经济政策的目标、措施及实现程度进行了研究^[2];冯玉军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来探讨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3]。关雪凌等著作《普京政治经济学》采用普京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理论解读了普京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成效,涉及了普京强国理念、资源民族主义、跨国公司、寡头和利益集团等内容^[4]。刁秀华《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聚焦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存在的问题与根源、发展态势等问题,并探讨了如何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5]。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出版的《俄罗斯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历年俄罗斯黄皮书,总结了 2012—2021 年俄罗斯的年度经济状况,并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评述。

(二) 有关利益集团的研究

曲文轶等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国家战略和国内社会3个不同层次系统考察了俄罗斯构建自贸网络的逻辑,其中从国内社会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也传递着俄罗斯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图^[6]。陶林分析了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演变的过程以及呈现出的对权力的依附性、高度的垄断性、极端的自利性、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显著特征^[7]。ЛОГВИНЕНКО分析了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国家互动中的游说技术,并提出要重视游说规制^[8]。БУРЕНКО区分了非政治性利益集团和政治性利益集团,主要分析了政治性利益集团和作为政治机制的游说^[9]。МАДЕВА讨论了中产阶级发展的制度问题以及前景^[10]。

通过文献回顾可见,目前关于俄罗斯入世以来经济治国方略的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但多数仍停留在梳理和解读经济政策本身,缺乏从理论层面解释其背后的逻辑机制。此外,关于经济政策制定背后的动因,大部分局限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面,没有将经济政策的制定纳入到全球化的发展与世界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以及国内社会层面中利益集团的互动中。本文采用了国际-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法,并结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贫困化增长理论、社会联盟等理论框架,希望有助于从宏观上更加清晰地了解和把握俄罗斯经济治国方略的逻辑,为俄罗斯政府的政策选择提供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机制,这也可以为中俄推动“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进一步经贸合作提供参考。

二、俄罗斯入世以来的经济基本面

(一) 宏观经济状况及能力评估

1. 宏观经济情况

长期以来,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GDP增长率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程度较大。图1是入世

以来俄罗斯GDP增速示意图,入世之后,俄罗斯始终难以调整产业结构,出口减少、投资不振使得经济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勉强支撑经济微弱增长。2014年底,在西方制裁、油价暴跌、卢布贬值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俄罗斯爆发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第四次经济危机,即结构性危机。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此次危机爆发使本就不景气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2015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为-1.97%,通胀率也上涨到15.53%,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不满情绪有所增加。2016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开始初步呈现积极态势,通胀率水平降至低点。2017年由于世界经济总体向好,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俄罗斯经济迎来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了复苏步伐,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俄罗斯金融系统表现较为平稳,卢布贬值并未引发严重通货膨胀。2021年,受新冠疫情和油价下跌的双重影响,俄罗斯经济再度出现了衰落,增长率为-2.95%。2022年受俄乌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再次遭受了西方严重的经济制裁。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底俄罗斯GDP将下降8.9%,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计GDP将下降7.8%^[11]。不过,GDP衡量的是年度范围内一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属于流量指标,不能单靠GDP衡量俄罗斯经济实力。虽然入世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明显乏力,但其继承了苏联时期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加之辽阔的国土面积、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储量等,因此,从存量角度来看,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仍旧不容小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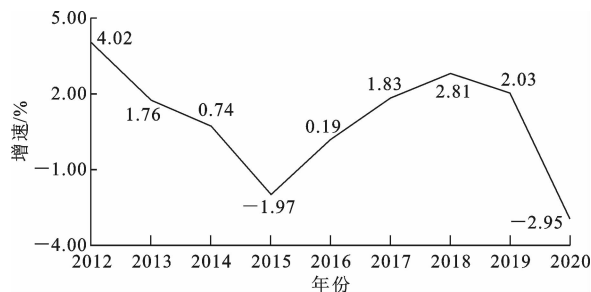


图1 入世以来俄罗斯GDP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

2. 产业状况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不均衡,能源、原材料、军事和重化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占比过重,制造和轻工业萎缩。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金属等领域的收入普遍高于传统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收入。2020 年,俄罗斯经济受疫情影响下滑严重,采矿业和制造业萎缩诱使工业产能衰退明显,煤炭、石油、天然气产量减少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

相比之下,俄罗斯农业呈现出积极增长态势,尤其是种植业农作物收成再创新高,农副产品的出口量也显著增长。入世以来俄罗斯农业连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似乎成了带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新兴引擎。从粮食自给总水平看,自 2011 年起俄罗斯保持了粮食自给有余的势头;从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2014 年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已经超过 700 千克,远高于世界水平,如果按上述两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俄罗斯已经具备了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5]。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2010 年俄罗斯服务业产值为 7 551 亿美元,占 GDP 的 59.28%,服务业从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 60%,服务业成为了俄罗斯第一大产业^①。然而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言,无论是在总量、质量还是细分领域上,俄罗斯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其中,批发零售业、汽车及其他维修服务、运输行业和旅游业相对较强,通信、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等领域仍然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入世之后,俄罗斯也逐渐开放了银行、电信、交通物流等 11 个行业,这有助于推动俄罗斯服务业更快提质升级。

3. 失业率

IMF 数据显示,入世以来俄罗斯的失业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近年来稳定在 5% 左右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从失业人群的年龄构成来看,俄罗斯青年群体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大致在 15% 左右,是全年龄段失业率的 3 倍。

4. 政府财政状况

尽管 2014 年俄罗斯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但俄罗斯政府依然具有较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并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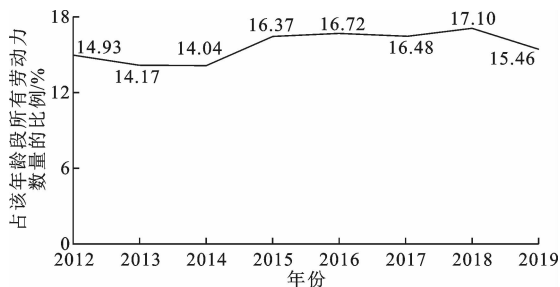
现债务违约等极端情况。2013—2017 年俄罗斯财政一直保持小规模赤字。由于 2017 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受世界市场上高涨的大宗商品需求拉动,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止跌回升,2018—2019 年恢复盈余状态。从图 2 可以观察到,俄罗斯财政收入和支出占 GDP 的比重总比保持稳定,维持在 35% 左右。

在债务方面,入世以来俄罗斯债务水平呈现了上升趋势。2020 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俄罗斯社会面临经济活动停顿和生产生活危机并存的局面。补贴企业和救助失业人群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债务水平攀升。从图 3 中可以看出,2020 年俄罗斯财政由盈余转为赤字,赤字额占 GDP 的比重为 -4.02%。政府债务水平增加了约 5 万亿卢布,债务占 GDP 的比重增加了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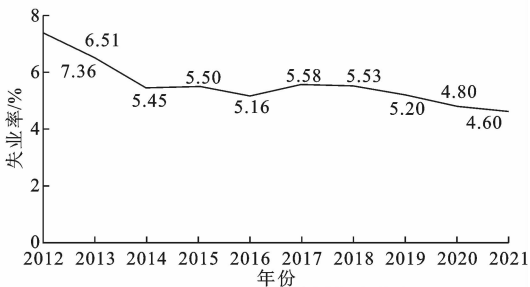
(二) 经济治国方略的主要政策方向

1. 重视经济发展,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前提

俄罗斯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问题。2012 年普京在第三届任期伊始颁布



(a) 2012—2019 年 15—24 岁青年群体总失业人数



(b) 2012—2021 年俄罗斯失业率

图 2 入世以来俄罗斯全年龄段/青年失业率

注:数据来源于 IMF 官网(其中 2021 年为预测数据)。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网站在线数据库,参见 <http://data.un.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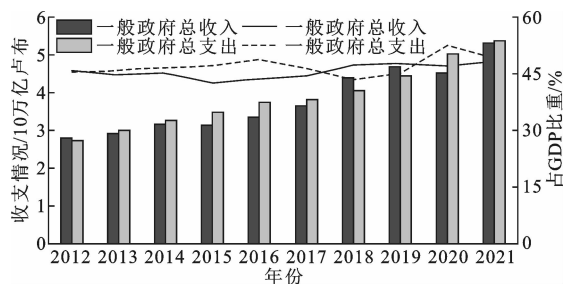


图3 入世以来俄罗斯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IMF官网(其中2021年为预测数据)。

了“五月法令”,要求未来6年必须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民众收入,并提出了相关量化指标。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前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АЛЕКСЕЙ УДЮКАЕВ)自2013年6月上任以来,就明确指出,要想促进经济发展,首当其冲应该彻底摆脱经济单一化倾向,鼓励发展多元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建立有效而稳定的经济增长机制。2018年普京于第四届任期伊始又发布了新一轮“五月法令”,以俄罗斯2024年前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前五强为目标,规划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中小企业、解决人口问题在内的12个“国家项目”,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旨在推动经济走出停滞阶段,实现稳定持续增长。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普京新任期的经济增长计划带来了打击,俄政府调整了“五月法令”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七月法令”、《2030年前俄联邦国家发展目标》和《国家经济恢复计划》等新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在人才培养、城市环境、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长期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确保2030年GDP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俄罗斯政府在致力于提高经济发展增速的同时,多次强调结构转型升级对提振经济的重要性。具体可以细分为4个方面。第一,通过培养技术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等方式来提高创新能力,改善经济结构。第二,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转型,2017年《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确定了包括法律法规管理、生态系统建设、人才培养、研究能力、信息安全在内的五大基础方向和重点领域,

2019年推出了“数字经济”国家项目并加大了投资力度。第三,俄罗斯政府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主要表现在扶持农业、减少工业对能源行业的过度依赖上。2013年颁布的《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发展战略》提出,俄罗斯能源战略的中心思想要从“资源-原料”模式改变为“资源-创新”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近年来,俄罗斯农业持续呈现积极态势,成为俄经济增长新引擎,农产品出口额持续走高并成为了仅次于能源产品的出口品。在工业领域,俄罗斯也在挖掘造船、航空等具有传统优势的军事工业潜力,《2030年前俄联邦国家发展目标》中也提到“相比2020年能源非原料产品出口实际增长不低于70%”。不过,从低附加值原料出口模式向高附加值创新深加工发展模式转型的构想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难度都很高,俄罗斯目前的前景也不甚乐观。第四,俄政府希望增强经济独立自主性,强化进口替代并扶持出口。2014年,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将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与创新发展战略、再工业化等其他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2015年的进口替代政策五年发展计划中指出,很多战略行业进口份额在80%以上,这对俄罗斯经济竞争力构成了威胁,基于此,未来五年要将总体进口依存度减少到40%,具体措施包括国家项目投资、采购国产商品、扶持高新技术进口替代项目、补贴出口商品的部分成本等。2016年俄罗斯在进口替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药品工业、化学工业、轻工业、重型机械、道路设备等领域,俄罗斯基本上实现全部进口替代。

2. 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消费和投资来增强市场活力

从俄罗斯经济基本面来看,经济长期缺乏高速增长基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消费增长停滞和投资增长乏力。由此,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外,历年来国情咨文中也数次提到要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消费和投资来增强市场活力,主要措施包括减少对企业的监管和限制、提高监管机构工作质量和效率、冻结税率、吸引资金回流、保护私有

财产、鼓励帮扶建立工业园等。2020 年,俄罗斯出台了《俄联邦国家经济恢复计划》和《2030 年前俄联邦国家发展目标》,其中,《俄联邦国家经济恢复计划》提出要通过延期纳税或免税、延期缴纳或免除社会保险费、给予遭遇困难的企业优惠信贷支持等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通过建立大项目投资支持机制、数字化投资审批程序、完善破产制度等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并刺激投资,从而弥补经济受疫情影响而造成的损失。《2030 年前俄联邦国家发展目标》指出,与 2020 年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不低于 70%。此外,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不乐观,俄消费市场也较为低迷。俄罗斯政府多次强调要通过拉动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3. 改善人口问题,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问题是其经济长期疲软的因素之一。俄罗斯有大量来自中亚的劳务移民,这也反映了国内适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由于自然增长率低,俄罗斯也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了“母亲基金”等财政支持措施来提高生育意愿。2017 年俄罗斯劳动人口下降近百万人,2018 年国情咨文指出需投资 3.4 万亿卢布使得未来 10 年俄罗斯人口稳定增长(过去 6 年已投入 2.47 万亿卢布),2020 年国情咨文提出,要将俄罗斯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 1.5 提升至 1.7,并于 2025 年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2]。此外,俄罗斯还面临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方面很多年轻人渴望早就业赚钱,拒绝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人才外流严重,这导致俄罗斯经济发展受到人力资源危机的限制,因此俄罗斯政府政策中也强调要优化移民政策,引进和储备专业人才。同时,政府也重点关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收入分配公平化、弱势群体生活救济等问题。

4. 欧亚平衡的对外经济政策:既紧密团结独联体国家,又采取“向东看”战略

在北约东扩和西方经济制裁的压力下,俄罗斯一方面紧密团结独联体国家,另一方面采取了“向东看”战略,以增加自身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地位。在 2011 年 10 月总统竞选前夕,普京

就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构想,经济意图上希望建立统一经济空间。2012 年普京再次上任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恶化,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主要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打造自身的对外贸易网络,贸易伙伴的选择也基本是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中心展开。近年来,联盟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包括和东盟合作、与独联体、欧亚开发银行等域内多边机制保持良好互动等。此外,观察员国数量也进一步扩大,乌兹别克斯坦和古巴获得观察员国地位。在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俄罗斯积极采取“向东看”战略,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建设跨欧亚大陆通道设想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2014 年,中俄两国签订了 4 千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通过“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线从西伯利亚东部向中国每年输气 380 亿立方米,中俄合作的大项目还包括田湾核电站组建设以及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等。

三、俄罗斯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

探析——基于国内外互动与

国际 - 国家 - 社会

三维分析框架

由于各国的要素禀赋不同,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会不同。比较优势强调,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根据赫克歇尔 - 俄林(HECKSCHER-OHLIN, H-O)模型,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富资源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稀缺资源的产品。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就形成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如何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提高各国经济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根据斯托尔帕 - 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当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时,一国相对丰富要素所有者获益,相对稀缺要素所有者受损。虽然由里昂惕夫悖论引出的人力资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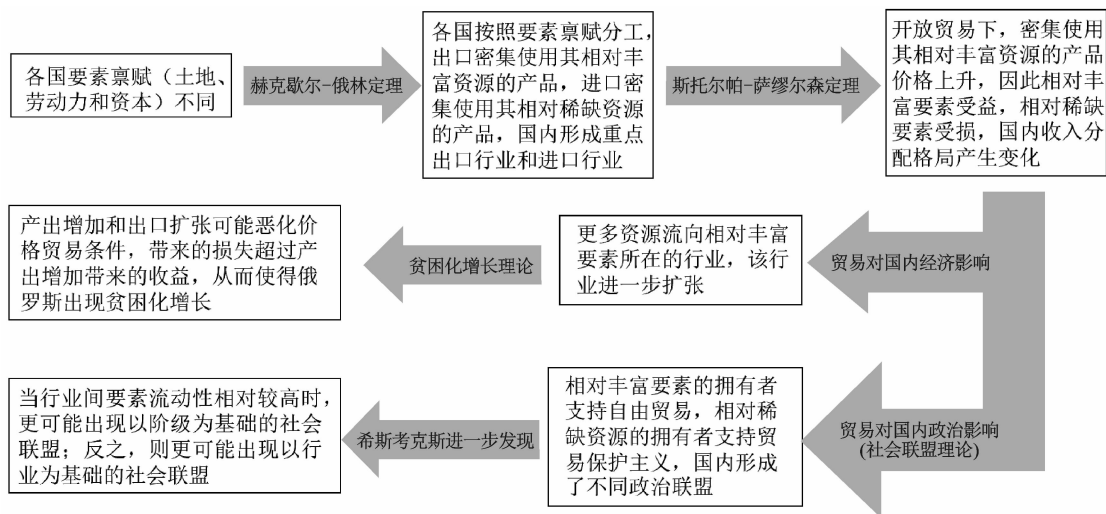


图4 本章理论分析框架

其他因素对 H-O 模型进行了修正,但经济学家仍然认为该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12]。

(一) 国际贸易对俄罗斯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俄罗斯入世后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非常丰富,俄罗斯科学社会政治研究所的《俄罗斯:复兴之路》报告中称,俄罗斯已探明的资源储量占全球 21%^①。俄罗斯学者奥·切尔科维奇在《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俄罗斯》书中援引权威数据称,俄罗斯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价值约 30 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而美国、中国和西欧分别为 10 万亿、5 万亿和 2.5 万亿美元^②。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俄罗斯积极开展能源贸易,大力开拓能源市场,与其他能源大国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展开竞争。由于能源行业获利颇丰,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到生产能源原料及初级产品当中,能源领域的开采和出口日益扩张。根据资源禀赋优势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俄罗斯延续了资源型国家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主要依靠资源依赖型的投资导向和出口导向拉动经济。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俄罗斯作为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力发展资源行业可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种经济模式不仅固化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且挤占了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资源,同时使俄罗斯经济陷入贫困化增长模式。

2. 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最早由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提出,首次将贸易条件跟国家福利和贸易战略的选择联系在一起。贸易条件反映了专业化分工后全球总产出的增长在贸易伙伴国间的分配关系,其衡量标准是一国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的相对世界价格比,贸易战略大致可以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后来 BHAGWATI 认为,经济扩张导致的产出增加可能会恶化贸易条件,从而抵消了经济扩张带来的收入效应^[13]。彼得·林德特在《国际经济学》中归纳了贫困化增长的 3 个前提条件,即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国民经济的增长必须是偏向于出口的、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无价格弹性的,因此出口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14],国内学者王如忠补充了另一个必要条件,即该国是能够影响世界价格的贸易大国^[15]。

3.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因分析

从短期来看,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给俄罗斯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但长期来看,能源行业并未将俄罗斯带入经济强国的行列当中。俄罗斯经济自 2012 年便陷入增长停滞阶段,入世十年以来经

① 常喆,《俄罗斯正在重新崛起 20 年后超过英法》,原载《环球时报》2004 年 11 月 4 日,参见 <http://mil.news.sina.com.cn/2004-11-04/0851239955.html>。

② 转引自刘燕平《俄罗斯国土资源与产业管理》,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 页。

济发展质量不高,并且呈现出产业结构原材料化、出口原材料化、投资原材料化的“三化”特点。根据罗伯金津斯基定理,当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时,一种要素禀赋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产量增加。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荷兰,由于发现了大量天然气,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产业,出口急剧增加,国际收入顺差,经济短期非常繁荣。然而,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产业使得其他工农业部门备受打击,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如制成品出口下降、通货膨胀、失业率急增等问题。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扩张吸引了资金、人才、劳动力等要素从其他行业流向能源行业,也出现了上述“荷兰病”的问题。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资源陷阱”呢?贫困化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思路,俄罗斯经济满足其 4 个前提条件。具体而言,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1 年俄罗斯贸易依存度为 52%,2020 年世界平均水平为 52%,中国大陆为 35%。外贸依存度是贸易(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衡量一国经济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程度,可见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第二,俄罗斯入世后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强化资源行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利用能源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出现偏向于出口的局面。第三,能源产品的国外需求相对缺乏价格弹性,而供给弹性较大,面对其他能源大国的激烈竞争,尤其是如今世界能源市场越来越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俄罗斯不断进行能源出口扩张,出口供给的扩张使得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第四,俄罗斯是贸易大国,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出口产品上格外具有世界价格影响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21 年俄罗斯货物进出口总额约 8 000 亿美元,居世界第 18 位。因此,能源类产品的产出增加和出口扩张可能恶化价格贸易条件,带来的损失超过产出增加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俄罗斯出现贫困化增长。

此外,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增加了俄罗斯经贸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群”、英国脱欧等逆全球化浪潮下,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

抬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初级产品出口也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比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手段,由于俄罗斯出口结构处于较低层次,极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2014 年以来的西方制裁让俄罗斯意识到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在抵御外部经济波动时的脆弱性。

鉴于此,俄罗斯政府希望能努力调整好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的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俄罗斯将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增加制造业、农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比例,并与创新发展战略、再工业化等其他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才是关键。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对社会带来一些冲击,因此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既要求经济具有承受震荡的能力,又要求决策者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目前看来,这两个条件俄罗斯都不具备。俄罗斯采取的是资源依赖型和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并举,一方面继续通过能源行业维持经济稳定,另一方面逐步发展创新经济来增强经济活力。虽然此举比较适合俄罗斯经济的实际情况,但缺点是周期长、见效慢,未来俄罗斯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国际贸易对俄罗斯国内社会政治的影响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同时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待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是阶级分析,重点关注由于经济利益而产生的阶级分化,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了民主政体的选择。

2. 社会联盟理论

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会对国内社会不同行为体产生影响,社会联盟理论分析了国内社会行为体如何通过游说、拉拢等方式对国家贸易政策施加影响。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

分析》书中对冲突的原因提出了3种意向的解释,分别是人性、国家内部结构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其中“第二层意象”研究了国内政治结构对于国际冲突的影响^[16]。与之相反,GOUREVITCH在1978年发表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中将国际体系作为自变量、国内政治作为因变量,分析了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社会的政治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社会联盟理论^[17]。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工和产业链中,国内收入分配受到国际经济的显著影响,社会联盟理论正是围绕国际经济政策对国内社会各利益集团福利的效应展开研究。古洛维奇将国际体系定义为国家间权力分配和经济财富分配两个维度,并将国内政治概括为具体事件、具体决定、政策、政体类型和联盟模式5个层面,其中联盟模式主要指政党、特殊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等国内社会力量与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

根据“颠倒的第二意象”,ROGOWSKI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分化联系在一起。他在《贸易与政治》一书中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认为由于贸易开放有利于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拥有者,这部分人倾向于形成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联盟,而国内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倾向于结成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联盟^[18]。基于ROGOWSKI的研究,HISCOX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冲突会在国内政治中形成何种分化,他认为,关键因素是行业间要素流动性,并以行业间的工资和利润率差异、人力资源流动率、工作年限和企业研发投入作为衡量要素流动性高低的4项指标。当行业间要素流动性相对较高时,贸易对不同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影响不同,更可能出现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联盟;当要素流动性相对较低时,由于行业间有了比较明显的信息和技术壁垒,贸易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有所不同,更容易出现以行业为基础的社会联盟。HISCOX比较了6个不同国家的情况,比如在英国阶级冲突更明显,而在法国大量行业集团进行政治游说活动,削弱了阶级联盟的作用^[19]。此外,现有文

献也论述了这两种模式对经济的不同影响,OLSON认为广泛的阶级联盟更可能扩大整个经济体,而非仅仅专注于抢夺现有经济体中的资源^[20]。BHAGWAI认为以行业为基础的大规模游说集团会将很多资源浪费在瓜分利益的政治斗争上,而非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上^[21]。

3. 统一俄罗斯党的执政基础与民意支持:“谁获益-谁受损”分析

尽管俄罗斯经济水平持续低迷,但自普京上任以来始终拥有西方领导人难以匹及的民意支持率。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6月对普京工作支持率高达83%^[22]。从收入背景来看,经济地位和收入水平对支持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比于中高收入人群,除退休人群外的低收入群体对普京的支持率也相对更低,尤其是失业人群和蓝领阶层,这些人是经济政策下的福利受损者。中产阶级是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的最大票仓,这部分人群多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白领阶层,参政能力和意愿更强,依赖于国家的稳定和扶植政策。俄罗斯中产阶层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与政权紧密联系,即更大比例的中产阶层是国家公务员^[10]。相比于中产阶级,富人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较强,对政权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影响力。因此,尽管最富裕群体对普京的支持率比低收入群体更低,但并非最稳定的群体,相比而言,中产阶级是最坚定的支持者^[23]。

究其原因,第一,西方制裁引起了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心理。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人愈发感受到西方的敌意和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从历史传统来看,俄罗斯人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概念和反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在危机面前通常拥有传奇般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个体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会暂时下降,这从整体上推高了民众的支持率。第二,俄罗斯社会的另一典型特征是民众与上层精英相对较为割裂,垂直权力体系的扩张阻碍了正常信息沟通机制,当代精英阶层与民众之间很难产生共鸣与相互理解,普京上任以来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来改善,比如举行年度“普京连线”、“年终记者招待会”、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等,这客观上加强了民众和政权的沟通,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获得了民众的好感度,增强了政权的稳定性。第三,虽然低收入群体对普京政权存在不满,但从国情咨文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在西方制裁和疫情等因素带来的经济打击下,俄罗斯政府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和帮扶,使民众福利下降有限,这也在客观上增强了部分低收入人群对统俄党政权的支持率。

4. 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冲突以及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渠道

全俄舆论中心民意调查显示,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对于普京治国理政能力不满。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作为统俄党的最大票仓,俄罗斯中产阶级分化为了两类群体,一类是支持政权稳定的公务员,另一类是对普京执政高度不满的商人和企业家。俄罗斯中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诉求,也缺乏较强的凝聚力,仅仅是在打击腐败、促进社会公平等议题上存在共识,因而无法形成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组织。

当今俄罗斯国内社会形成了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并直接影响了具体经济议题上的政治决策。在俄罗斯,最有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包括军工综合体、石油天然气游说集团、媒体及其控股公司、银行和金融游说集团,以及大企业和各种行业(例如酒精、机械、制药、建筑、零售及其他游说集团)等。俄罗斯很多利益集团的活动高度官僚化,利益集团往往成为“国家机构的利益代言人”和“来自大众的官员”,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例如,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在整个后苏联时期都未能迫使其社会伙伴——国家和雇主——向雇员支付工资,工会的无能为力使低工资成为俄罗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24]。因此,俄罗斯民众认为这些协会、政党、企业等利益集团无法充分保护和代表大众利益,这也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中的相对畸形状。正如 OLSON 所言,以行业为基础的利益联盟不利于从整体上做大做强经济体^[20]。掌握对经济资源操控权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更多关注的是“瓜分蛋糕”而非“做大蛋

糕”,相对缺乏制定长远经济战略规划的能力^[25]。俄罗斯经济学家 БОДКОВ 也曾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提取价值并在国内分配^[26]。游说是俄罗斯利益集团广泛使用的方式之一,最广泛采用游说手段的利益集团是大公司和商业协会。根据一项专家调查结果发现,不文明的游说行为(即腐败)在俄罗斯存在着。国际经验表明,通过特别立法来监管利益集团行动的方式有助于减少腐败。然而,虽然制定游说方面的相关法规可能改变腐败的局面,但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商人和官员都反对通过游说法^[27]。自 1993 年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多次尝试通过立法规范游说活动均未果。任何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式都不是在真空中运行,人的因素在现实政治中至关重要,特别是政治精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资环境、社会生态、人力资源,甚至民众情绪的变化^[25]。上述提及的利益集团的问题也导致了俄罗斯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中小企业营商环境需要优化等问题。鉴于此,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努力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支持,这不仅实现创新发展,也是提升政治支持和成就真正“奇迹”的关键所在。

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俄罗斯联邦政府及其下属的各个部门在对外经贸关系制定上很容易受到以行业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游说。从不同部门的立场来看,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负责制定对外经济战略和国家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上主要受钢铁制造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影响较大,支持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尤其愿意同经济体量较小且较容易达成谈判的投资型国家开展自贸谈判,这有助于直接提高其部门绩效,通过促进国家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带来更多实际利益。俄罗斯最大的钢铁矿业公司谢韦尔集团(Северсталь)认为欧洲市场前景有限,着眼于开拓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潜力^[28]。俄罗斯外贸银行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国有控股银行也积极游说经济发展部与越南、塞尔维亚达成自贸协定。其前监事会主席 АДЕКСЕЙ УДЮКАЕВ 在

2016年腐败丑闻被曝光之前的任期内同时担任经济发展部部长,他在2014年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区的建设,并提议在贸易中直接使用卢布-越南盾结算,这也正与俄罗斯外贸银行在越南拓展的业务有关。俄罗斯农业部的立场较为矛盾,既希望推动本国农产品的出口,又希望获得更多的政府保护。由于俄罗斯农业部在贸易政策上具有两面性,其立场也容易受到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农业机械制造集团(Росспецма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之一,其总裁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БКИН就积极游说政府将自由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政策^[29]。从总体来看,俄罗斯农业部愿意支持与俄罗斯农业资源互补且不形成竞争关系的国家开展贸易,比如伊朗和塞尔维亚。其中伊朗作为自贸伙伴,与俄罗斯存在互补性的原材料国家,可以推动在非资源加工领域的合作。根据俄罗斯政治学家巴普洛夫的观点,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对政府和竞争集团的制裁能力等因素^[30]。除这些资源外,政府对利益集团的兴趣和依赖性也非常关键。军工综合体和石油天然气游说团体对当局的影响力要比中小型企业 and 加工业大得多,正是因为国家对前者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后者。能源、军工行业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具有优先地位,既是支撑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又是俄罗斯经济结构中最畸形的行业。这两个关键行业拥有非常强势的利益集团,通过权钱交易、游说等各种手段左右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26]。俄罗斯工业贸易部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相对保守,它代表俄罗斯国内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声音,经常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游说。原因在于,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大规模敞开市场将导致制造业在对外开放中受到冲击,而且制造业本身与俄罗斯军事部门、精密仪器部门、安全部门联系紧密,完全开放市场也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由于能源产业出口通常零关税且没有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俄罗斯能源部对贸易自由化政策并不热衷。正如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所言,这限制了俄罗斯对

全球能源转型条件的适应,抑制了非资源部门的创新和新市场的开发,使俄罗斯经济落伍于新能源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三) 国家战略层面——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例

社会联盟理论虽然很好地解释了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回答了社会内部谁获益、谁受损的问题,并将国际层面的贸易与国内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有学者指出,社会联盟理论忽略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过于关注社会内部的分化,并未将国家视为独立的行为体,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度^[31]。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例,由于要素禀赋相似、经济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彼此间缺乏贸易合作基础,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显著不足。尽管存在内部贸易不足、非关税壁垒较多等问题,但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在成立初期,俄罗斯的构想是建立政治与经济联盟,不过由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政治联盟的设想最终没能实现。相比于国内社会层面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国家的自主性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推动力更大。国家被看作是拥有领土和人民的一种组织,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非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32]。欧亚经济联盟设立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俄罗斯团结独联体国家、加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战略需要。

四、结语

从国际层面,入世使俄罗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开放贸易下资源型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给其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困难,结构转型迫在眉睫。作为资源大国,俄罗斯在享受石油美元不断流入带来“资源红利”的同时,也受到了“资源诅咒”。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巨额利润,资金源

源不断流入能源行业,导致能源行业不断扩张,最终使得俄罗斯陷入“贫困化增长”局面。俄罗斯政府希望能努力调整好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的经济结构,从历年来俄罗斯国情咨文中可见,调整经济现有模式、推动经济现代化始终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方向。俄罗斯将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增加制造业、农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比例,逐步推动创新经济、再工业化等国家战略增强经济活力,但未来俄罗斯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国内社会层面,利益集团也影响了俄罗斯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产阶级是统俄党的主要票仓,但其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诉求,相对缺乏凝聚力。俄罗斯国内形成了以行业为基础的社会联盟,通过游说等方式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自贸伙伴的选择问题上。不过,由于行业联盟的利益集团重心是瓜分利益而非做大经济体,腐败的游说行为在俄罗斯盛行,导致了俄罗斯营商环境恶有待优化、中小企业发展不利、贫富分化等问题。为了加强社会稳定、巩固选民基础,俄罗斯政府也努力采取了改善营商环境、给予弱势群体经济补贴等政策。

从国家层面,俄罗斯对外经济战略的制定也体现了国家自主性。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例,尽管俄罗斯国内利益集团对于自贸伙伴的选择存在不同的政治诉求、欧亚联盟内部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俄罗斯政府仍然坚定地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加强区域自由贸易的经济考量,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考虑也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本文以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重要时间节点,评估了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并梳理了普京经济治国方略的重点方向,并试图从“国际-国家-社会”三层次为其提供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机制解释。2022 年初爆发的俄乌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与挑战,也给俄罗斯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世界性大国,未来俄罗斯经济将如何从长期低迷的状态中走出来? 普京经济治国方略将出现哪些新的变化? 这些问

题对于中俄开展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以及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而言至关重要,值得继续跟踪关注。

参考文献:

- [1] 李建民.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J]. 俄罗斯研究,2019(6):3-30.
- [2] 张聪明. 普京经济政策偏好及特点:基于国情咨文的考察[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5):51-65,155.
- [3] 冯玉军. 利益得失的权衡——俄罗斯利益集团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J]. 国际贸易,2003(9):13-16.
- [4] 关雪凌,张猛. 普京政治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5] 刁秀华. 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6] 曲文轶,杨雯晶. 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J]. 俄罗斯研究,2021(6):115-139.
- [7] 陶林. 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演变的过程和特征[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0(6):14-21.
- [8] ЛОГВИНЕНКО Д.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лоббирования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групп интересов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J].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2016(8):31-34.
- [9] ВУРЕНКО В И, ШУМИДОВ 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ого подхода[J]. PolitBook,2012(4):9-18.
- [10] МАДЕВА Т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J].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2008(11/12):94-98.
- [11] Всемирный банк с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л па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ВП на 8,9 процента[EB/OL]. (2022-06-07)[2022-07-26]. <https://ria.ru/20220607/vvp-1793786179.html?ysclid=150iskmhev468102239>.
- [12] GOMES-CASSERES B, YOFFIE D B.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petition:cases and notes i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M]. 2nd ed. New York:McGraw-Hill,1994.
- [13] BHAGWATI J.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 [14] 彼得·林德特. 国际经济学[M]. 9 版. 范国鹰,陆生军,陈捷,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 [15] 王如忠. 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 [16] 肯尼思·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M]. 2版. 信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7] GOUREVITCH P.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8, 32(4):881-912.
- [18] ROGOWSKI R.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9] HISCOX M J.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factor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ongressional votes on trade legisla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2, 96(3):593-608.
- [20]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1] BHAGWATI J.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2] Одобр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EB/OL]. (2022-06-07) [2022-07-26]. <https://www.levada.ru/indikatory/odobrenie-organov-vlasti/>.
- [23] 曲文轶. 经济因素、普京的政治支持及2018年大选[J]. 国际经济评论, 2018(2):93-111.
- [24] ВУРЕНКО В И. Группы интересов и лобб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зарубежный опыт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J]. Вестни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4):5-10.
- [25] 冯玉军. 俄罗斯经济的政治社会根源及国家发展前景[J]. 欧亚经济, 2022(1):1-11, 125.
- [26] ВОДКОВ Д. Мадам де Помпадур в Москве.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рис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EB/OL]. (2021-09-30) [2022-07-26]. <https://carne-gie.ru/publications/85439>.
- [27] ВАШКАТОВА А, РОДИН И. В России не будет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го лоббизма. Чиновникам, депутатам и бизнесменам выгоднее продвиг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оставаясь в тени[EB/OL]. (2009-12-16) [2022-07-26]. https://intercom-audit.ru/smi/2009/12/16/bkr-smi_367.html.
- [28] Глава “Северстали”: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бизнеса интересны Африка и Вьетнам[EB/OL]. (2010-12-03) [2022-07-26]. <https://www.vesti.ru/finance/article/2037063>.
- [29] ИЛИНА 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бкин: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нуждается в “трех с половиной поворотах”[EB/OL]. (2016-11-30) [2022-07-26]. <https://www.nakanune.ru/articles/112383>.
- [30] ПАВОЗ А В. Government Relations как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J].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ПОЛИТЭК, 2005(2):238-251.
- [31] 田野.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J]. 国际政治科学, 2008(2):55-80, 4.
- [32]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找回国家[M]. 方立维, 莫宜端, 黄琪轩,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责任编辑:杨海挺)